

西秦乞伏飞桥有关问题辨正

刘 满

(兰州大学, 兰州 730000)

摘要: 此文从西秦乞伏飞桥的建造年代、建桥者、位置、飞桥所在地的景观特点和地貌特征, 以及飞桥的长度和高度诸方面, 通过比较, 说明西秦乞伏飞桥与河厉不是同一座桥; 通过以上诸方面的分析论证, 证明飞桥建在今甘肃永靖县岷源乡李家塬头南、原刘家峡上峡口的河峡上; 同时还证明乞伏飞桥根本不会建在今炳灵寺侧的黄河上。所谓飞桥在炳灵寺侧黄河上的说法, 一是前人的误判, 二是后人疏于考证的认同。

关键词: 飞桥 河厉 赤岸 河夹岸 炳灵寺

中图分类号: K242.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1-6252 (2012) 01-0017-19

1951年10月, 甘肃已故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到炳灵寺石窟作了考察, 并写了《炳灵寺石窟勘察记》(初步报告)一文, 先后在《甘肃日报》和《光明日报》发表, 引起了全国的关注, 炳灵寺一名才广为世人所知。后来, 中央文化部、西北文化部和敦煌文物研究所联合组成的炳灵寺石窟考察团, 对炳灵寺石窟作了进一步考察。《水经注》中记载的唐述窟、时亮窟和唐述水的位置, 在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前, 还是郦学大师们尚未解决的问题。冯国瑞先生是当时最先考察炳灵寺石窟的学者, 是他最早给《水经注》中的唐述窟、时亮窟和唐述水作了准确的定位。^①

人们对外界事物的认识都有一个过程, 即由不知到知之, 由知之甚少到知之甚多, 由模糊朦胧到清楚明白。从1951年10月冯国瑞先生到炳灵寺考察算起, 至今已经过去整整六十年了。在这期间, 学术界关于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的研究, 有了很大的进步, 发表了很多有价值的论文, 也出版了不少专著。当然, 在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中, 还存在一些问题。有些问题还存在争议, 有些问题还须进一步深入讨论。而且

收稿日期: 2011-01-09

作者简介: 刘满 (1942-), 男, 甘肃兰州人。兰州大学退休教师, 主要从事西北历史地理研究。

^① 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 原载1951年《甘肃日报》和《光明日报》。又见郑炳林主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 兰州: 甘肃文化出版社, 2011年, 第179页 “现在的上寺, 就是唐述窟, 下寺就是时亮窟。……下封是地名, 现在寺沟峡南流入黄河的水, 就是魏晋时所称唐述无疑。”笔者按: 冯先生所说的上寺和下寺, 就是今永靖县杨塔乡境内的上炳灵寺和下炳灵寺, 唐述水就是今炳灵寺侧南流入黄河的大寺沟(水)。

在这些问题中,有的是目前学术界面对的大问题、重要问题,如凤林津、凤林县、凤林关和凤林桥的位置,西秦时乞伏飞桥的位置,还有炳灵寺侧的寺沟峡上古代有没有道路、渡口和桥梁等等。在本文中,笔者先就西秦乞伏飞桥的有关问题谈一点意见,以求教于专家学者。

因得地利之便,笔者曾多次到过炳灵寺。为了完成本文的写作,2010年10月5日(重阳节),笔者专门到炳灵寺水库上下作了一次实地考察。重点考察的地方有刘家峡水库北岸、永靖县岷源镇的李家塬头,水库南岸东乡族自治县考勒乡的红崖子,炳灵寺东西两侧的山岩,还有炳灵寺对岸、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安集乡的果园魏家村。同行的有国家图书馆赵林先生、兰州大学张立公先生。

一、飞桥与河厉不是同一座桥

《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刊载了李并成先生《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一文(以下简称《李文》)。该文认为,《水经·河水注》中吐谷浑建造的河厉和西秦乞佛(伏)建造的飞桥是同一座桥。该文是这样说的:

其实炳灵寺附近黄河上的桥梁建造,早自十六国西秦时即已见记载。《水经注·河水》引《秦州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乞佛(伏)于此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则该桥应建于乞伏西秦时期。同书又引段国《沙州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陞,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之,施钩栏,甚严饰。”有人认为以上二桥实为一桥,……^①

飞桥和河厉“实为一桥”说,见于《丝绸之路》1995年第5期发表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丝绸之路上的黄河古桥梁》。^②在十几年之后,《李文》又旧话重提,而且认同了这一说法。我们认为,飞桥和河厉的位置是丝路研究的重要问题,飞桥和河厉“实为一桥”说是一个新说法,又得到了李并成先生的认可,而且发表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敦煌研究》上,这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我们认为,飞桥和河厉“实为一桥”说,是对《水经注》飞桥、河厉和有关记载的误解,这一说法与古文献的记载是不符的,是不能成立的。下面我们就这两座桥的有关情况作一番比较研究,看看飞桥和河厉是否是同一座桥。

在今青海、甘肃两省境内的黄河上,见于《水经·河水注》记载的桥梁有三座:第一座是东汉时贯友修建的浮桥,第二座是吐谷浑修建的河厉即河桥,第三座就是西秦修建的飞桥。

^① 李并成、马燕云《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敦煌研究》2010年第2期,第76页。

^② 贺养州《丝绸之路上的黄河古桥梁》,《丝绸之路》1995年第5期,第30-31页。

第一座桥建造的时间是东汉永元五年（93），建桥的人是东汉护羌校尉贯友：

河水又东迳允川，而历大榆、小榆谷北，羌迷唐、钟存所居也。永元五年，贯友代聂尚为护羌校尉，攻迷唐，斩获八百余级，收其熟麦数万斛，于逢留河上筑城以盛麦，且作大船，于河峡作桥渡兵，迷唐遂远依河曲。永元九年，迷唐复与钟存东寇而还。十年，谒者王信、耿谭西击迷唐，降之，诏听还大、小榆谷。迷唐谓汉造河桥，兵来无时，故地不可居，复叛，居河曲，……^①

这是我国古代黄河上游最早的桥梁，距今已一千九百余年了。这是一座浮桥，位于大榆谷和小榆谷的北边。关于大、小榆谷的位置，清人董祐诚在他的《水经注图残稿》作了这样的定位：

《通鉴》注：大、小榆谷，即唐之九曲，在积石军西二百里。《宋史·地理志》：积石军北至西宁州（界）八十里。则榆谷当在今贵德厅西。^②

唐积石军的治所在今青海贵德县驻地河阴镇，清贵德厅的治所也在在今青海贵德县河阴镇，依照《通鉴》胡三省注和董祐诚的说法，贯友修建的浮桥当在今贵德县河阴镇西二百里，即今青海贵南县境内。我们认为，今贵南县是唐九曲的一部分，^③所以董祐诚大、小榆谷“当在今贵德厅西”的定位无疑是正确的。

对于大、小榆谷的地望，我们曾作过文献考证，也作过实地考察，认为：

大、小榆谷作为地域名，指的是贵南县的西北地区，即茫拉河、沙沟（河）两河河谷及其与黄河交会的沿河地区；作为“两谷名”，指的是今贵南县境的茫拉河河谷和沙沟（河）河谷。从流程和流域面积来看，大榆谷当为流程较长、流域面积较大的茫拉河，小榆谷当为沙沟河。^④

当年贯友“于河峡作桥”之“河峡”，就是今青海省的龙羊峡。贯友建桥的地方当在今龙羊峡上峡口、共和县和贵南县间旧时道路所经的渡口上，其地在今龙羊峡水库大坝之西、原查纳（查纳寺）东北的黄河上，今已没入龙羊峡水库。^⑤

《水经·河水注》记载的位于青海、甘肃境内黄河上的第二座桥，是吐谷浑修建的桥，叫“河厉”。关于“河厉”，《水经·河水注》是这样记载的：

案段国《沙州记》：吐谷浑于河上作桥，谓之河厉。长一百五十步，两岸累石作基陞，节节相次，大木从横，更镇压，两边俱平，相去三丈，并大材，以板横次

①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2，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2页。

② [清]董祐诚《水经注图残稿》卷2，见[北魏]酈道元著，[清]汪士铎图《水经注图》（外二种），中华书局，2009年，第908页。笔者按《水经注图残稿》原文作“积石军北至西宁州八十里”，脱一“界”字。据《宋史》卷87《地理志》记载：积石军“北至西宁州界八十里”，今据以校补，中华书局，1977年，第2169页。

③ 刘满《唐九曲及其相关军城镇戍考》，《敦煌学辑刊》2010年第2期，第12—14页。

④ 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一），《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1期，第130页，又收入拙著《河陇历史地理研究》，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5页。

⑤ 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一），《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第8页。

之，施钩栏，甚严饰。^①

前一座桥是浮桥，而这一座桥是完全用木料搭建的悬臂式木梁桥。桥身是用粗大的圆木“节节相次”互相镇压、叠架而成的。我国黄河上的古桥大多数为浮桥，而用木材为



图1 甘肃省渭源县清源镇渭河上的灞桥

梁，在黄河上架设跨度较大的桥梁，河厉可谓首开记录，这的确是一种创造。从《水经注》所记的情况来看，河厉的桥身与今甘肃渭源县驻地清源镇渭河上的灞陵桥相似（见图1），不同的是灞陵桥上建有廊，是廊桥，而河厉的桥面上是没有廊的。另外，灞陵桥的桥面是弧形的，而河厉的桥面“两边俱平”，桥面是一条直线。

必须指出，贯友修建的河桥

和吐谷浑的河厉，是先后修建的两座桥，而且是建在同一个地方的。也就是说，这两座桥先后建在《水经注》所说的大、小榆谷北边的黄河上，就是东汉时贯友“于河峡作桥”之“河峡”上，即今青海省龙羊峡上峡口、旧时共和县和贵南县间道路所经的渡口上，其地在今龙羊峡水库大坝西、原查纳（查纳寺）东北的黄河上。^②

到了唐代，又在贯友河桥和吐谷浑河厉所在的地方修了一座桥，名为洪济桥，又称洪济梁。^③

总之，贯友所造之桥，吐谷浑的河厉，还有唐时修建的洪济桥，是不同时期修建的河桥，但它们的桥址都在同一个地方。

《水经·河水注》记载的位于青海、甘肃境内黄河上的第三座桥，是西秦建造的飞桥。《水经·河水注》记载说：

漓水又东北出峡，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漓水出白石县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河水又迤左南城南。《十三州志》曰：石城西一百四十里有左南城者也，津亦取名焉。大河又东迤赤岸北，即河夹岸也。《秦州记》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乞佛于此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河水又东，洮

①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2，第23页。

② 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一），《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第8-11页。

③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9，中华书局，1983年，第995页，廓州积石军下：“金天军，在积石军西南一百四十里洪济桥。”又[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中华书局，1975年，第6104页“河之上流，繇洪济梁西南行二千里，水益狭，春可涉，秋夏乃胜舟。”

水注之。^①

这是我国古籍中关于飞桥最早的记载，也是保存下来的唯一记载。这一记载是比较具体的，它记载了飞桥的建造年代、建桥者、位置、飞桥所在地的景观特征和地貌特征，还记载了飞桥的长度和高度。这些记载为我们考证飞桥的位置，提供了很充分的依据。

上引《水经注》在记叙漓水“北流注于河”之后，才记载了飞桥的有关情况，而后才说“河水又东，洮水注之。”说明飞桥位于漓水入河口和洮水入河口这两个河口之间。漓水即今大夏河，洮水即今洮河。依《水经注》所记，飞桥位于今大夏河入河口之东、今洮河之入河口之西这一区间的黄河上，这就从比较大的范围内界定了飞桥的位置。

下面《水经注》又说“河水又迳左南城南，……津亦取名焉”，而后《水经注》才记载了飞桥。依《水经注》所记的顺序，漓水入河口之东是左南城，左南城南即黄河，左南津就在左南城南的黄河上，这就说明飞桥位于左南城和左南津以东的黄河上。已知左南城和左南津在今永靖县原白塔寺川附近（今已没入刘家峡水库）^②，这又说明飞桥位于永靖县原白塔寺川以东的黄河上。

我们再看，《水经注》接着又说“大河又东迳赤岸北，即河夹岸也。”依《水经注》所记，赤岸在左南城和左南津的东边，赤岸北边的地方叫河夹岸，飞桥就建在河夹岸上。关于赤岸，冯国瑞先生早就说过，赤岸“即红崖子”。^③在《西北黄河古渡考》（二）一文中，我们也说过：

红崖子是东乡县北黄河南岸的一段山地，西起考勒乡西北、本地沟西的红崖子村，往东依次是八十个塬、张家塬和他家塬，这里的黄河南岸是一片红色的山崖，故名。2003年8月，我们从永靖县的杨塔乡往东，经三塬乡、岷塬乡到永靖县城的路上，隔着刘家峡水库就清楚地看到水库东南的河岸上一片红色山地，这就是红崖子。^④

2010年10月5日（重阳节），笔者在炳灵寺考察时，拍下了红崖子一带山形水势的照片（见图2），顾名思义红崖子就是黄河南岸的一段红色的山地，它的北边就是河夹岸。请注意，有一段红色的山地，这是飞桥所在地南面的景观特征。

那么这个“河夹岸”又是什么呢？在古文献中，“夹”字的音和义，与“狭”字是相同的。如《后汉书·东夷传》记载说：

东沃沮在高句骊盖马大山之东，东滨大海；……其地东西夹，南北长，可折方

①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2，第27页。

② 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郑炳林主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171页。“左南城，即今白塔寺川”。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之“左南城渡”部分，载《敦煌学辑刊》2005年第4期。又收入拙著《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第76-79页。

③ 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郑炳林主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171页。“赤岸即今红崖子”。

④ 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第76页。

千里。^①

李贤注曰 “夹音狭”。



图 2 东乡县考勒乡的红崖子

“河夹岸”之“夹”，音义都与“狭”通，“河夹岸”者即河狭窄，就是黄河狭窄的河岸。这就说明，赤岸的北面是黄河狭窄的河岸，也就是黄河上的峡谷。^③

关于“河夹岸”的位置，清人董祐诚是这么界定的：

《晋书·载记》：张瑁屯于河夹岸，麻秋袭，败之。当在今河州东北大夏、洮河二口之间。^④

《水经注》是这么记载漓水、左南城、河夹岸和洮水等四个地名的先后和位置的：

漓水又东北出峡，北流注于河。《地理志》曰：漓水出白石县西塞外，东至枹罕入河。河水又迳左城南，……大河又东迳赤岸北，即河夹岸也。……河水又东，洮水注之。^⑤

从《水经注》所记来看，董祐诚关于“河夹岸”在今大夏河和洮河入河之间的说法是正确的。

我们认为，河夹岸绝不是黄河岸边狭窄的河谷川地，也不是寻常的黄河峡谷，而是一个两岸山岩陡峭、中间狭窄高深的黄河大峡谷。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前人将河夹岸的宽度和高度作了观测和记录 “岸广四十丈”、“桥高五十丈”。这就是说，河夹岸的南北两岸山岩间的宽度是四十丈，从飞桥的桥面到桥下黄河的水面的高度是五十丈。由此可见，飞桥不是建在地势平缓的河边阶地上，而是建在高山峡谷之上的。再从高度和

再如《徐霞客游记·游天台山日记》：

初七日，自坪头潭行曲路中三十余里，渡溪入山。又四五里，山口渐夹，有馆曰桃花坞。^②

这里的“夹”字，读音为“狭”，释义也是狭窄的意思。因此，在《西北黄河古渡考》（二）一文中，我们对“河夹岸”作了这样的诠释：

① [刘宋] 范晔撰，[唐] 李贤等注《后汉书》卷 85《东夷列传》，中华书局，1965 年，第 2816 页。下李贤注同此。

② [明] 徐弘祖《徐霞客游记》，中华书局，1986 年，第 4 页。

③ 刘满《西北黄河古渡考》（二），《河陇历史地理研究》，第 80 页。

④ [清] 董祐诚《水经注图残稿》卷 2，见《水经注图》（外二种），第 919 页。

⑤ [北魏] 酈道元著，[清] 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 2，第 27 页。

宽度来判断,这个黄河峡谷一定是石峡。因为只有黄河上的石峡才能达到这样的高度,即峡谷两岸山岩的顶部到下面的黄河水面的高度是五十丈。上面的记载,是具体的数字,没有一点含糊。所以还请注意:两岸山岩陡峭、中间是狭窄高深的黄河,这就是飞桥所在地的地形特征。古人的这一记载十分重要,它是我们考证飞桥位置的重要依据之一。而一些专家在探讨飞桥的有关问题时,对古人这一记载或者熟视无睹,或者是一笔带过,不作具体的分析和论证。专家们之所以在这个问题作出错误的判断,其原因可能就在这里。

东晋十六国时,一丈等于今245厘米,^①四十丈就是今98米,五十丈就是今122.5米。飞桥所在的地方“河夹岸”,是一处黄河上的峡谷,而且是一个石峡。这一峡谷上河岸的宽度大致就是飞桥的长度,也就是98米;飞桥的高度实际上也就是河峡的高度,也就是122.5米。必须指出,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古人关于飞桥长度、高度的记载,与飞桥实际的长度、高度肯定是有误差的。但我们认为,尽管如此,古人关于飞桥长度和高度的记载还是有根据的,基本上是可信的。因此在考证飞桥位置时,务必要考虑《水经注》的这一记载。以上就是我们对《水经注》关于河厉、飞桥记载的解读。

《李文》说:

有人认为以上二桥实为一桥,此种桥可称之为“伸臂木梁桥”。^②

据《李文》的注释,他的这段话出自贺养州的《丝绸之路上的黄河古桥梁》一文,我们查阅了该文,想找到“以上二桥实为一桥”说的出处及其根据。但令人遗憾的是,《丝绸之路上的黄河古桥梁》一文说“有人认为此二桥实为一桥,在文献记载中名称有异”。^③无论是《李文》,还是他引用的《丝绸之路上的黄河古桥梁》,都没有交代这个“有人”到底是谁,也没有说明河厉和飞桥这两座桥“实为一桥”说的依据是什么。

下面我们就讨论一下这一问题,看看飞桥与河厉是否是同一座桥?

从上述关于河厉与飞桥基本情况的叙述中,可以看出这是两座桥,是完全不同的两座桥。

首先,从建桥者和建桥年代看,两座桥就不是同一座桥。

据《水经注》记载“宋少帝景平中,拜吐谷浑阿豺为安西将军、浇河公”,^④所以河厉的建造者当为吐谷浑所建河南国的阿豺及其继任者,时间当在晋永嘉(307-312)末以后。而飞桥的建造时间是东晋义熙(405-418)中,建桥者为西秦乞伏乾归或乞伏炽磐。可见这两座桥不是同一座桥,这是证据之一。

其次,从河厉与飞桥的位置看,这两座桥也不是同一座桥。

① 王冠英《中国历代制度演变测算简表》,罗竹凤主编《汉语大词典·附录》,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4年。

② 李并成、马燕云《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第76页。

③ 贺养州《丝绸之路上的黄河古桥梁》,第30页。

④ [北魏]酈道元著,[清]王先谦校《合校水经注》卷2,第24页。

在上面的论证中已经说明,河厉在今青海省贵南县龙羊峡大坝西的原查纳(查纳寺)附近,而飞桥在今甘肃省永靖县岷塬乡(驻地芝家湾)李家塬头南原刘家峡上峡口的河峡上。这两座桥,一座在青海省境内的贵南县境的龙羊峡上峡口上,另一座在甘肃省永靖县岷塬乡李家塬头南的刘家峡上。两座桥所在地相去甚远,这怎么能说是同一座桥呢?这是证据之二。

再次,从河厉与飞桥的长度看,两座桥也不是同一座桥。

据《水经·河水注》记载“河厉长一百五十步”。旧制以营造尺五尺为一步,一营造尺合0.32米,^①一步合1.6米,一百五十步就是240米。如上所述,《水经·河水注》说飞桥“岸广四十丈”,合今98米。这样河厉的长度,就是飞桥长度的两倍还多。两座桥的长度的差别之所以如此之大,这是因为河厉所在地的河岸是龙羊峡上峡口河谷边的川地,而飞桥所在地是两山夹水的刘家峡所在的黄河峡谷。两座桥长度的差别如此之大,能是同一座桥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这是证据之三。

另外,从河厉与飞桥的高度看,两座桥也不是同一座桥。

如上所述,《水经·河水注》说飞桥是“桥高五十丈”,合今122.5米。河厉的高度虽然失载,但我们可以从《后汉书》和《水经·河水注》的有关记载中推算出来,贯友建造的河桥是浮桥。既然是浮桥,那么桥面与河面的距离是不会很高的,即使贯友当时专门“作大船,造河桥”,^②桥的高度也只能是几米或者十几米。

必须指出,河厉和飞桥虽然都是建在黄河峡谷地区,但它们在黄河峡谷上所处的位置是不同的。河厉建在龙羊峡上峡口西的河谷盆地上,这里河岸比较宽展,河厉的长度才能达到一百五十步,也就是240米。正是因为河厉建在龙羊峡上峡口西的河谷盆地上,所以河厉的前身即贯友所建的桥是浮桥,高度也就只有几米或者十几米。而飞桥是建在刘家峡峡谷的山顶上,这里两山夹河,飞桥就建在黄河两边高高的山岩上,桥的高度才能达到122.5米。从两座桥的高度来看,河厉和飞桥也不是同一座桥。如若不然,试问:在河岸开阔的龙羊峡上峡口、原查纳寺东北的河谷上,古人有必要在那样的地方修建122.5米高的桥梁吗?从施工技术和建筑材料来看,当时的人有能力在平地上修建高达122.5米高的飞桥吗?如果像《李文》所说河厉和飞桥是同一座桥,在原乞伏建造飞桥的地方,即今永靖县岷塬乡李家塬头之下的原刘家峡上能够修建长一百五十步、合今240米的浮桥吗?毫无疑问,回答都应该是否定的。这就说明,从两座桥的高度来看,河厉与飞桥也不是同一座桥。这是证据之四。

上述论证说明,河厉与飞桥这两座桥,在建桥者、建桥年代、桥的位置、桥的长度

① 《汉语大词典》第7册,第271页“营造尺”条:“唐以来历代营造工程中所用的尺子。也称‘部尺’。一营造尺合0.32米。《金史·食货志二》‘量田以营造。五尺为步……’《续文献通考·乐考八》:‘商尺者,即今木匠所用曲尺,盖自鲁般传至于唐,唐人谓之大尺。由唐至今用之,名曰今尺,又名营造尺。’”

② [刘宋]范晔撰, [唐]李贤等注《后汉书》卷87《西羌传》,第2883页。又《水经·河水注》作“且作大船,于河峡作桥渡兵”,见王先谦《合校水经注》卷2,第22页。

和高度等方面诸多不同，根本就不是同一座桥，所谓这两座桥仅仅是“在文献记载中名称有异”的说法，还有这两座桥“实为一桥”的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能成立的。

二、飞桥建在今甘肃省永靖县岷塬乡李家塬头南、 原刘家峡上峡口的河峡上

《李文》说：

有学者考得，乞伏飞桥的建造旧址即在今炳灵寺峡口黄河段，黄河南岸现遗留有巨石，传为建桥基址，北岸亦有架桥时所凿孔眼遗迹。^①

上面的引文说得十分清楚，炳灵寺峡口不仅有桥，这座桥就建在炳灵寺峡口黄河上。我们的看法与此不同，就是乞伏飞桥建在今甘肃省永靖县岷塬乡（驻地芝家湾）李家塬头南的原刘家峡峡谷之上。

通过上面对《水经注》关于飞桥记载的分析，我们认为，要考证飞桥的位置，必须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

第一、飞桥位于大夏河入河口和洮河入河口之间的黄河上；

第二、飞桥在左南城和左南津（两地均在今永靖县原白塔寺川附近，今已没入刘家峡水库）东边的黄河上；

第三、飞桥建在“赤岸”的北边，赤岸是黄河南岸一段红色的山地，这是飞桥所在地南面的景观特征；飞桥建在“河夹岸”上，河夹岸就是两岸山岩陡峭、中间是狭窄高深的黄河峡谷，这是飞桥所在地的地形特征；

第四、飞桥所在的河峡的宽度即飞桥的长度为 90 米；

第五、飞桥所在的河峡或飞桥的高度为 122.5 米。

这几个条件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

我们认为，飞桥就在李家塬头南、原刘家峡上峡口的河峡上。理由之一是，这里地处大夏河入河口和洮河入河口之间，而且也地处《水经注》所说的左南城和左南津的东边，也就是今永靖原白塔寺的东边。现在这里是刘家峡水库的库区，但从 1971 年绘制的 1：20 万的旧地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旧时刘家峡上下的情况（见图 3）。因此将飞桥的位置定在今李家塬头南的原刘家峡上，这就满足了上面所说的第一、第二个条件。

理由之二是，以李家塬头南的原刘家峡为飞桥桥址，完全符合《水经注》所说的飞桥建在赤岸北的河夹岸上的记载。飞桥建在赤岸北，赤岸就是今红崖子，即今东乡县境黄河南岸一段红色的山崖，这是飞桥附近的特殊景观。同样飞桥建在河夹岸上，即黄河高深的峡谷上，这是飞桥所在地的地形特征。因此，这两点是我们考证飞桥位置的重

^① 李并成、马燕云《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第 76 页。

船到炳灵寺。^①

刘家峡“峡谷切入基岩100多米，呈V字形”，“河面宽100~200米”，说明无论从河峡的深度，还是河峡的宽度，都与《水经注》记载的河夹岸和飞桥的情况相接近，这就说明将飞桥考定在李家塬头南的刘家峡上，完全可以满足《水经注》要求的第四、第五个条件的，从而说明河夹岸及其飞桥就在今李家塬头南的刘家峡的峡谷上。

这里又有一个问题，就是刘家峡总长12公里，仅洮河口以西的一段就有几公里长，飞桥的具体位置究竟在哪里呢？赵仁魁、康玲的《左南城和乞佛飞桥考》（以下简称《飞桥考》）一文，为我们回答了这一问题：

……飞桥就在刘家峡上峡口，即李家塬头之下的河峡上。因为，这河峡上有河夹岸，岸广、桥高的情况，与《水经注》所载相符。正如当地老人们讲的“这河峡中有座形状如香炉的巨石耸立，俗称香炉台，台高几十丈，台大如楼顶。”90年春，我们曾在向导带领下，乘刘家峡水库水位下降之际，从李家塬头看见了香炉台的真面目。正是由于左南城之东15华里的刘家峡上峡口，即李家塬头之下的河峡中有耸立而起的巨石—香炉台，昔日的乞伏炽磐才利用它为天然的桥栋，花了3年功夫，修起了当时著名的黄河飞桥。^②

《飞桥考》认为，飞桥位于李家塬头之下的河峡上，具体地说就在今永靖县岷塬乡（驻地芝家湾）的李家塬头南、原刘家峡上峡口的河峡上（今已没入刘家峡水库）。1995年出版的《永靖县志》也持这种说法。^③

我们认为，《飞桥考》的位置说是有理的，因为它符合《水经注》关于飞桥位置的有关记载，完全满足了我们所说的考证飞桥位置的五个条件。这是一篇值得注意的文章，因为是它最早提出了飞桥位于李家塬头南、原刘家峡上的说法，将飞桥位置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说到这里，我们以《水经注》中的记载为依据，关于飞桥位置的讨论应该说是完成了。但是现在还必须讨论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李家塬头南的原刘家峡南北两边有没有道路可以通行。因为古人之所以在高山峡谷上搭建飞桥，目的是为了沟通黄河两岸、便利南北往来，因此飞桥的两岸是一定要有道路相通相连的。如果李家塬头南、原刘家峡上只有高高在上的飞桥，而两边根本没有道路相通相连，我们关于飞桥在李家塬头南、原刘家峡上的说法，无论如何也是不能成立的。

从1971年编绘、1971年出版的1:20万的旧地图上看，当时东乡县城驻地锁南，经龙泉公社（驻地四甲集）、考勒公社（驻地八羊桥）到黄河北岸的李家塬头及其所属的三原公社（驻地肖赵家），都是有山路相通的。从三原公社往东到永靖县驻地小川，往

① 焦北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词典·甘肃省》，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58页。

② 赵仁魁、康玲《左南城和乞佛飞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第116页。笔者按：原文“桥栋”应作“桥墩”。

③ 永靖县志编纂委员会编《永靖县志》，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575页。

西到白塔公社、何堡公社和杨塔公社，也是有道路相通的（见图4）。之所以如此，这与当地的地形有着密切的关系。“塬”是西北黄土高原上的一种地貌，就是它的四周是流水冲刷而成的沟壑，中间呈台状，而且比较平坦。在李家塬头一带，以“塬”命名的地名很多，如在李家塬头北就有三塬、岷塬、马路塬、陈张家塬、尤家塬、刘家塬等，在李家塬头以南、黄河南岸的东乡县境内有八十个塬、张家塬、他家塬、周家塬、范家塬和下塬等。这种以“塬”命名的地方，显著的特点就是地处高而平的山塬上。这些以“塬”命名的地方修建的道路，一般来说是不用进入山沟，也不用翻越高山，都是沿着高而平缓的山塬行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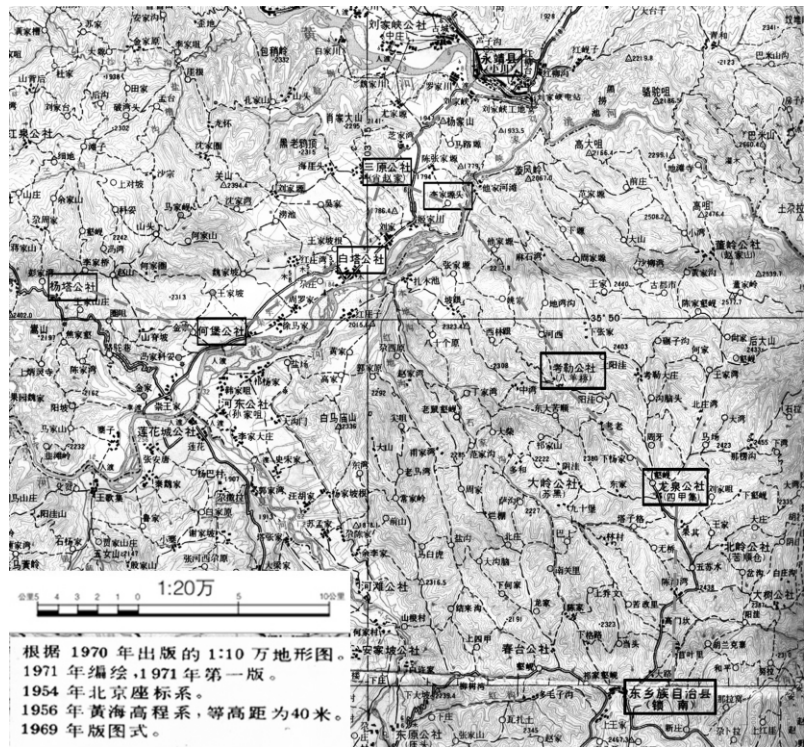


图4 李家塬头黄河南北的山塬

我们在实地考察时发现，现在李家塬头的东西都是刘家峡水库的库区，只有岷塬镇（驻地芝家湾）往南到李家塬头这一线一直深入到水库之中，好像一个半岛，因此李家塬头现在是刘家峡水库当中南北两岸距离最近的地方（见图5、图6）。李家塬头周边的地方在水库蓄水后都被淹没了，甚至连李家塬头南、原来的刘家峡峡谷也淹没在了水下，这就说明岷塬镇到李家塬头一线是这一带最高的地方。上述论证说明，李家塬头南的黄河峡谷两岸是高高的山塬，山塬上是有道路相通相连的。由此可见，李家塬头南的刘家峡上完全具备修建飞桥的条件。

那么飞桥所在的黄河两岸的山塬上，古代这里有没有道路呢？



图5 水库修建后的李家峡头

据上引《水经注》记载，左南城、左南津的东边是赤岸，赤岸北边就是飞桥所在的河夹岸。赤岸与左南城、左南津之间，赤岸与飞桥之间，肯定是有路相通相连的。据《晋书·张轨传》记载：

（张）重华以谢艾为使持节、军师将军，率步骑三万，进军临河。（麻）秋以三万众距之。……张瑁从左南缘河而截其后，秋军乃退。艾乘胜奔击，遂大败之，……秋匹马奔大夏。^①



图6 今日之李家峡头

谢艾率军到左南城，欲渡河进攻大夏（今甘肃广河县阿立麻土乡古城），麻秋率军在该地与之相拒，这说明当时左南城、赤岸与大夏之间是有道路相通的。

飞桥建于东晋安帝义熙年间（405－418），到唐代德宗时，已经过去了四百年，当年的飞桥早已不复存在。但从唐代人吕温出使吐蕃行经的地方来看，当时这一带也是有道路相通的。吕温，字和叔，河中（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人。据《旧唐书·吕温传》记载，他是在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出使到吐蕃的。^②从出使期间的诗作来看，他是经由当时的临洮（《临洮送袁七书记归朝》）、河州赤岸桥（《题河州赤岸桥》）到河源军（《经河源军汉村作》，河源军治所在今青海西宁市）的。^③诗中的

① [唐] 房玄龄等撰《晋书》卷86，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2－2243页。

② [后晋] 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37，中华书局，1975年，第3769页。

③ 见《全唐诗》卷371，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923页。

临洮指的是唐时临州的治所狄道县（治所在今甘肃临洮县洮阳镇），因“（临）州郭旧有临洮军”，^①故称临洮。《题河州赤岸桥》一诗说：

左南桥上见河州，遗老相依赤岸头。

匡塞歌中受恩者，谁怜被发哭东流。^②

上引诗中说到两个地名，一是左南桥，一是赤岸头。左南就是左南城，故址在今永靖县原白塔寺公社附近（今已没入刘家峡水库）；赤岸就是河夹岸南面的红色的河岸，即今甘肃东乡县考勒乡一带的红崖子。

我们认为，吕温从临洮到左南桥，大夏县城是必经之地。唐穆宗长庆二年（822）刘元鼎出使吐蕃返程途经河州，《新唐书·吐蕃传》记载说：

元鼎还，虜元帥尚塔藏館客大夏川，集東方節度諸將百餘，置盟策台上，遍曉之，且戒各保境，毋相暴犯。^③

这里的大夏川，指的不是古大夏川（洮河支流，今名广通河），而是指古大夏川流经的唐大夏县所在地，即今甘肃广河县西阿力麻土乡古城。^④但当时吕温并没有经由河州，而是从今临洮县经由大夏县（治所在今甘肃广河县西阿力麻土乡古城）往左南桥，在那里渡河后到河源军的。

从《水经注》和一些文献记载来看，古时从大夏县到飞桥、左南桥所在的赤岸一带的黄河，是有路相通的。在考证飞桥位置时，飞桥所在地两边有无道路可通，这也是我们必须满足的条件，否则在黄河峡谷上建造那么高的河桥就完全成为无的放矢了。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乞佛飞桥是建在今甘肃省永靖县岷源乡（驻地芝家湾）李家塬头南、原刘家峡上峡口的河峡上的。

三、乞伏飞桥根本不会建在今炳灵寺侧的黄河上

前面我们的考证已说明，飞桥建在今甘肃省永靖县岷源乡（驻地芝家湾）李家塬头南的原刘家峡上（今已没入刘家峡水库），它和河厉根本就不是同一座桥。说到这里，按理说也就没有必要再来讨论飞桥是否建在今炳灵寺峡口黄河上这一问题了。之所以在这里还要讨论这一问题，一是因为这些年来，一些“游记、文论、书刊、画册等，

① [唐]李吉甫撰，贺次君点校《元和郡县图志》卷39临州下，第1002页。

② 见《全唐诗》卷371，第923页。

③ [宋]欧阳修、宋祁撰《新唐书》卷216下《吐蕃传下》，第6103页。

④ 王忠《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年，第142页。“《册府元龟》九八—外臣部盟誓云‘元鼎回过河州，元帥尚榻藏，……館元鼎于大夏川……’河州即今甘肃临夏，所滨河现今仍名大夏河，时为吐蕃东方政治文化中心，东道元帥即驻跸于此。”笔者按《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唐河州“所滨河现今仍名大夏河”说有误。唐河州治所滨之水古名“漓水”，今名“大夏河”，为黄河支流；唐河州大夏县侧之水古名“大夏川”，今名“广通河”，为黄河支流洮河的支流。二水均见于《水经·河水注》。《册府元龟》“馆元鼎于大夏川”之大夏川，指的不是今大夏河，而是唐大夏川水之滨的大夏县。

都说乞伏飞桥建在炳灵寺大寺沟门左侧的河峡上，并把它混同为“天下第一桥”。^① 二是一些专家学者现在仍然重复飞桥建在炳灵寺侧黄河上的旧说，而且将大寺沟门左侧黄河南岸的石刻和所谓遗迹拿来作证，以此证明所谓“天下第一桥”就在这里。因此，证明飞桥在今永靖县岷塬乡李家塬头南原刘家峡上，这只是一个问题的一半，另一半是要证明所谓飞桥建在今炳灵寺侧黄河上的说法与文献记载是不符的，同时还要证明在炳灵寺侧的黄河上根本没有建造飞桥的条件。这样才能使我们的论证具有更加充分的说服力，才能说是完全解决了这一问题。

我们查阅了我国权威的地名辞典，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新《辞海》、《中国历史地名辞典》和《中国历史地名大辞典》，这几部地名辞典中都没有“飞桥”的词条。《中国历史地图集》和《中国史稿地图集》中，也没有“飞桥”的位置。虽然如此，但是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关于飞桥位置的讨论一直在持续不断的进行中。

最早将飞桥的位置与炳灵寺联系起来的是著名学者冯国瑞先生。他在《炳灵寺石窟勘察记》中说过：

涉过唵哥集的银川河，上了小坡，积石峡（笔者按：应该是今寺沟峡）谷中的奇异状态，渐渐的陈列出来。……经过果园魏家的庄子，未停留……大家争先的到河南岸，是一大石滩，石块都像屋子大，我们一边候渡，一边寻访石滩的材料，有“龙窝”二字石刻，及“万笏朝天”四字石刻。又有诗刻一首：“山风滔浪浪滔沙，两岸青山隔水涯。第一名桥留不住，吾侪□□卧芦花。”未题名都在水石激荡之处，拿字看，最远不过唐宋。而这里有桥，可能始于西秦乞伏氏时期（公元409年左右）。因为西秦据枹罕全境，曾作过枹罕飞桥，……秦州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义熙中乞伏于此作飞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②

从冯国瑞先生的记述来看，他所说的建桥的地方在今炳灵寺南、黄河南岸一个叫果园魏家的村子。村子的北边“是一大石滩”，“龙窝”、“万笏朝天”及“第一名桥留不住”等石刻，都刻在果园魏家村北石滩的巨石上。据此，冯国瑞先生说“这里有桥，可能始于西秦乞伏氏时期”。冯先生首先肯定这里有桥，最早建桥的时间可能是西秦时。冯国瑞先生的说法只是一种揣测，并没有肯定飞桥就在这里。

阎文儒、王万青先生的《炳灵寺石窟总论》一文，也持这种看观点：

永靖炳灵寺峡口，黄河南岩，现均没于水，水库中有石刻“天下第一桥”。字额大尺余，刻于河南岸水边大石上，水涨时，仅露石背不可见。冬春水枯乃能见之。石大至数间屋，传为建桥基址。北岸峡口亦有架桥石洞基址，正与相对。桥始建于何时不可考。《水经注》卷二“河水”条云：秦州记曰：枹罕有河夹岸，岸广

① 赵仁魁、康玲《左南城和乞伏飞桥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3年第1期，第117页。

② 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郑炳林主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170-171页。笔者按“吾侪□□卧芦花”句，张思温《积石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年，第51页作“古碑含恨卧芦花”。

四十丈。义熙中乞伏于此河上作飞桥，桥高五十丈，三年乃就。……与其地正合，惟不知此前有桥否？若以吴调元诗意观之，桥已不存在矣！^①

阎、王两位先生也认为这里有桥，而且与西秦飞桥有关。张思温先生的《积石录》一书将原寺沟峡中的石刻统称之为“桥滩石刻”。该书注明：

桥滩石刻“在永靖县炳灵寺峡口黄河南岸，现均没于水库中”。石刻共有四处，其一为“天下第一桥”，其二为明代河州贡生吴调元的一首诗（首句为“山风淘浪浪淘沙”），其三为“万笏朝天”四个字，其四为“龙窝”二字。^②

冯国瑞先生只说石刻在果园魏家庄附近的“大石滩”上，张思温先生说石刻在“果园魏家村北半里灯山寺南大石上”。

果园魏家是个村庄，村北半里是一个“大石滩”，大石滩的北边才是黄河。也就是说，果园魏家村北是一个河漫滩，河漫滩北是黄河。必须指出，果园魏家村北的“大石滩”就是张思温先生所说的“桥滩”，可能因为传说这里曾有过河桥，故名。冯国瑞、闫文儒和张思温三位先生所说的地方，尽管名称不一，但指的都是一个地方，即今炳灵寺石窟和与之隔河相对的果园魏家村。

近年，飞桥建在炳灵寺侧黄河上的说法，又成了学者一再重复的话题，《丝绸之路上的黄河古桥梁》、《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炳灵寺：十万佛光照高峡》等，对此说得既明确又肯定。如《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说：

天下第一桥桥址，位于安集乡三坪村鲁班附近的鲁班滩里，……天下第一桥始建于西秦。^③

《炳灵寺：十万佛光照高峡》一文则进一步说：

炳灵寺码头上有个“天下第一桥”的石碑，人们都纳闷，桥在哪里呢？其实，桥在西夏时期就被毁了，旧址早已被黄河水所淹没了。……

“有河夹岸，岸广四十丈，……”《水经注》中记述了天下第一桥的修建过程。

天下第一桥位于永靖县城西 35 公里，地处刘家峡水库尾端，为小积石山怀抱的炳灵寺姊妹峰附近的石门口，桥的一头在炳灵寺水帘洞前，另一头在对面的鲁班滩里。^④

因为专家们的不断地重复，飞桥建成在炳灵寺侧黄河上这一说法，现在似乎已成了不争的事实。《李文》就是认同这一观点而且有较大影响力的论文。文章说：

有学者考得，乞伏飞桥的建造旧址即在今炳灵寺峡口黄河段，黄河南岸现遗留有巨石，传为建桥基址，北岸亦有架桥时所凿孔眼遗迹。^⑤

① 阎文儒、王万青《炳灵寺石窟总论》，郑炳林主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 88 页。

② 张思温《积石录》，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89 年，第 51—53 页。

③ 董克义总编《积石山保安族东乡族撒拉族自治县志》，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1998 年，第 360 页。

④ 王文元《炳灵寺：十万佛光照高峡》，《丝绸之路》2008 年第 7 期，第 15 页。

⑤ 李并成、马燕云《炳灵寺石窟与丝绸之路东段五条干道》，第 76 页。

我们认为，无论从古文献的记载来看，还是从当地实际情况来看，上述说法都是没有根据的，乞伏飞桥绝对不会建在今炳灵寺侧黄河上的。

上面我们已经对《水经·河水注》关于飞桥的记载已作了分析与解读，现在只要将《水经·河水注》记载的河夹岸及其附近的地形地貌，与《水经·河水注》记载的炳灵寺侧黄河两岸的地形地貌和实际情况作一下对比，就会看出，两者是完全不符的：

1、《水经·河水注》记载说飞桥在漓水（今大夏河）入河口之东、洮水（今洮河）入河口之西，即漓水入河口和洮水入河口这两个河口之间。若依《李文》等的飞桥在炳灵寺侧黄河上说，飞桥不仅跑到了洮水入河口的西边，而且还跑到了漓水入河口的西边，也就是跑到了漓水入河口和洮水入河口的西边。《水经·河水注》说飞桥在左南城、左南津（均在今永靖县原白塔寺川附近，今已没入刘家峡水库）的东边，赤岸（今东乡县北、黄河南岸的红崖子）的北边。若依《李文》等的飞桥在炳灵寺侧黄河上说，飞桥不但跑到了左南城的西边，而且也跑到了赤岸的西边。《李文》等的飞桥在炳灵寺侧黄河上说，除了飞桥建在黄河峡谷上这一点与《水经·河水注》相符外，其余飞桥与漓水入河口、洮水入河口、左南城、左南津，还有赤岸等地的方位，均与《水经·河水注》的记载错位了。此其一。

2、《李文》等的飞桥在炳灵寺侧黄河上说，与《水经·河水注》所载的飞桥的高

度、长度完全不相符合。

从1971年编绘、1971年出版的1：20万的旧地图上，果园魏家村位于炳灵寺东南不远处，就在寺沟水（即《水经注》所说的唐述水）入河口东南不远处的黄河南岸（见图7）。从地形图上可以清楚地看出，炳灵寺上下的一段黄河都是在河峡中东流的，只有炳灵寺以东到果园魏家这一段，黄河的流向由向东转而向南，在流经果园魏家村东之后，又转而改向东南流，这样就在果园魏家村北形成了一个河湾。果园魏家村北的黄河北岸是绵延陡峭的山岩，而该村北边的河岸就比较宽展平缓，村北半里的黄河南岸有一片大的河滩，这就是



图7 刘家峡水库蓄水前的寺沟峡

张思温先生所说的“桥滩”。《李文》所说的“传为建桥基址”的“巨石”，就在这个河滩上，而且《李文》所说的“架桥时所凿孔眼遗迹”就在这个河滩对岸的山岩上。

刘家峡水库蓄水之后，果园魏家依然存在，只有村北边的河滩即所谓的“桥滩”现在已沉入了水下。从地图上可以测出，果园魏家村北到黄河北岸，宽度有几百米，而乞伏飞桥的长度只有 98 米，两者的差距是非常大的。因此从长度上看，乞伏飞桥就不是建在原果园魏家村北的黄河上的。

再从高度上看。“飞桥”高 122.5 米，要在河峡上建造这样的高桥，黄河两岸必须有两座隔河相对、至少高达 120 米左右的山岩，而且这两座山岩的距离在百米上下，这样才符合《水经注》关于飞桥高度、长度的记载。果园魏家所在的寺沟峡峡谷，北岸山岩高峻陡峭，是完全可以达到搭建飞桥的高度的。而这里的黄河南岸却是黄河的河滩，河滩以南是村庄，再往南才是比较高的山岩。这样在原果园魏家村北黄河南岸的大石滩上，根本找不到与北岸相对、高达 120 多米、可以支撑桥梁的山岩。

《李文》说原果园魏家村北“黄河南岸现遗留有巨石，传为建桥基址，北岸亦有架桥时所凿孔眼遗迹。”《李文》的上述说法作为“飞桥”的传说是可以的，但是作为论证飞桥位置的依据是不行的，是经不起推敲的。乞伏“飞桥”就是驾设在高山上的桥梁，它的桥面距离黄河河面的距离将近百米。在距今 1600 多年的古代，这样高的桥或者是索桥，或者是悬臂木梁桥，两者都只能是悬空驾设的，不可能以黄河岸边的“巨石”作为“建桥基址”修建起来的。再说 122.5 米的高度，到底有多高呢？就是一座每层高 3 米、共有 40 层的高楼，接近一座现代的摩天大楼。如果说飞桥是建在原果园魏家村所在的黄河上，如此之高的飞桥，当然先要在南岸建一个 120 米高的桥墩。别的不说，仅仅就说在河滩上建一座高达 120 米的桥墩这件事，这在当时都是匪夷所思的事情。用什么作材料呢？当然河滩里的“若数间屋”大的巨石可能会派上用场，可是怎么把这些大石或者其它的石料吊到上百米高的空中呢？以当时的条件，要在今炳灵寺峡口搞这么大的工程是绝对不可能的。由此可见，《李文》等的飞桥在炳灵寺侧黄河说是不能成立的。此其二。

3、如果飞桥在炳灵寺侧黄河上，与哪条道路相通相连呢？

我们在前面论证飞桥的位置时说：在高高峡谷的山岩的顶上修一座横跨黄河的桥梁，古人的目的是十分明确的，就是沟通黄河两岸，便利南北往来。因此，飞桥的两岸一定要有道路相通相连的。假设如《李文》等所说的，飞桥是建在炳灵寺侧黄河上的，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飞桥的两端始于哪里，又走向何方？因为飞桥的高度比寺沟峡上的黄河河面，还有炳灵寺石窟下的地面，均高出 120 多米，试想：这么高的河桥与哪里来的道路接轨，过河后这条道路又该通向哪里？如果这样的高桥两边没有道路对接，这样的高桥有什么用处呢？难道古人会突发奇想，要在这里修建一座高达 120 多米的河桥用来鸟瞰炳灵寺一带的风光吗？因此，从高度上看，在原果园魏家所在的黄河上

是没有地方可以修建飞桥的。此其三。

以上几条充分证明，乞伏飞桥根本不会建在今炳灵寺侧的黄河上。

四、飞桥在炳灵寺侧黄河上这一说法的原由

飞桥在炳灵寺侧黄河上这一说法无疑是不能成立的，现在我们来探讨一下这一说法出现的原由。

首先要说的是，这是从一个古老的传说引出的一个说法。因为鲁班滩上自古以来有很多巨大的石头，这就出现了所谓鲁班爷在黄河上建桥的传说。说鲁班为了在黄河上修桥，就赶着很多石头来到这里。这是炳灵寺侧的河滩上大石的由来，也是人们认为这里古代有桥的原因。传说鲁班在这里造过桥，后人就将这个河滩命名为“桥滩”。其实，这里自古及今没有路，这里的黄河上也没有渡口，更没有修建过河桥。进一步说，不仅西秦飞桥没有建在这里，后人关于炳灵寺侧黄河上有桥的说法，也是一种误判。关于这一问题，我们将另外撰文论证。

最早说桥滩建有河桥的，是无名氏在桥滩巨石上刻下的“天下第一桥”几个大字，这一石刻将桥滩上建过河桥的说法给肯定下来了。这一块碑刻的作者是无名氏，也没有留下碑刻的年代。据冯国瑞先生判断，这些字“最远不过唐宋”。^① 鲁班在黄河上建桥的传说和无名氏“天下第一桥”的石刻，这两件事孰先孰后，今天我们已经难以断定了。但是这两件事一先一后，实际上给桥滩曾经建有河桥这件子虚乌有的事作了旁证。到了明代嘉靖年间，河州贡生吴调元因疏于考证，在巨石上刻上了“第一名桥留不住，古碑含恨卧芦花”的诗句，这又给桥滩曾经建有河桥说又增加了一个证明，把这一说法向前推进了一步。

炳灵寺南的桥滩下本来是没有桥的，可是鲁班造桥的传说、“天下第一桥”的碑刻、再加上“第一名桥留不住”的诗作，都在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同一个故事。久而久之，桥滩上不仅有过桥，还有过“天下第一桥”。再到后来，这个天下第一桥和西秦的飞桥就联系在一起了。我们认为，飞桥在炳灵寺侧桥滩说致误的原因有二，一是由于前人误断，二是后人疏于考证的认同。

^① 冯国瑞《炳灵寺石窟勘察记》，郑炳林主编《永靖炳灵寺石窟研究文集》（上册），第171页。